

# 天启成都《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研究

熊梅 林靖翔

**提要：**《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中的文化景观可分为政治、宗教、文教功能等7种类型，反映出明末成都作为承宣布政使司中心所在地所具备的城市职能。此图的绘制方式与城池布局彰显出中正和谐、等级尊严和仿生取象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刻意塑造，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又反映出自然环境对城市形态的制约。由图可窥成图的年代、公署布局的发展趋势和佛教、道教的演化形势，却未能显示城市经济的发展状况。该图虽未超脱时代局限，也存在一些绘制或标注错误，但某些特殊标识或可成为今后方志舆图研究的新旨趣。

**关键词：**明 天启 成都 《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

明天启元年（1621）刻本《新修成都府志》由知府冯任总裁，推官罗宽校对，县令谢奇举等人纂修而成，全书共58卷，是在成化十二年（1476）李敏所编修的《四川成都府志》基础上纂修而成，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都府志。<sup>①</sup>该书对明代成都府的山川分野、疆域形胜、城郭关梁、古迹名胜、官守名宦、食货赋役等内容记载翔实，而且在卷首还附有4幅舆图，即《府治合属郡县总图》《府治合属郡县山水名胜图》《学宫图》和《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以下简称《宫室图》）。<sup>②</sup>作为现存最早的成都方志舆图，《宫室图》绘制出完整的城池、城门以及城内的街区，反映了天启成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景观的分布，为后世展示了图文相证的成都社会风貌，在古代成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目前，有关明天启成都方志舆图《宫室图》的研究尚不多见。《四川通史·元明卷》中认为《宫室图》与明代其他地方志中的城镇地图别无二致，体现出一种“目中无人”的观念<sup>③</sup>；张克勤认为《宫室图》反映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传统测绘方法与西方测绘方法的综合成果。<sup>④</sup>在景观与地名研究方面，《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城中的城垣、公署、河道等进行考证<sup>⑤</sup>；胡开全、张莉红对明代蜀王府、书院展开研究。<sup>⑥</sup>总体看来，针对《宫室图》的专题研究仍暂付阙如。侯仁之曾言，“由于那些古旧地图多出自当时人之手，保存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往往给后世的研究者以意想不到的启迪”<sup>⑦</sup>。有鉴于此，本文拟探究天启成都《宫

①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流传不广，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刻本，是仅存之孤本。我国内地只有两部钞本流传，分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本文采用的是成都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整理的天启《新修成都府志》版本。参见杨文华：《从传统史学的偏旁进入方志——天启〈成都府志〉版本流传与编纂特色》，高志刚主编：《志苑集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3—60页。

② 参见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成都旧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通志类”，第7册，第1—4页。

③ 参见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元明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5—76页。

④ 参见张克勤：《成都地图》，《四川测绘》1995年第4期。

⑤ 参见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⑥ 参见胡开全：《成都明代遗迹考略》，《文史杂志》2020年第4期；张莉红：《明代成都的城市文化》，中国明史学会、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主编：《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440—447页。

⑦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序录》，“序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页。

室图》的景观类型、绘制特点、信息传达与错讹之处,以期对传统成都方志舆图的研究带来助益。

## 一 《宫室图》的景观类型

宏观而言,学术界通常将景观分为未经过人类活动重大改变以前就已存在的自然景观和经由人类活动创造或改变以后的文化景观两类。<sup>①</sup> 经统计,《宫室图》所绘的景观共99个,自然景观仅有“百花水”和“威凤山”两处,文化景观达97个,占全图景观的绝大部分。

按照不同的功能为依据,在某一特定时期,景观的某种功能凸显到完全能够代表该景观的特征时,以它的这种显著特征作为该景观区别于其他景观的标准。由此,《宫室图》中的文化景观可分为7种功能类型: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宗教功能、文教功能、交通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娱乐休闲功能。政治功能景观指由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或藩王府下辖的政治机构和为这些政治机构提供服务的场所;经济功能景观指提供商品交换和促进贸易发展的场所;宗教功能景观指由官府或民间修筑的寺庙、道观和被官方认可的祭祀场所;文教功能景观指传经授课的场所和考试场地;军事功能景观指负责军事镇守和军队管理的都司和卫所;交通功能景观指道路、桥梁一类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功能景观指由政府设立,以保障民生的养济院、粮仓等公共设施;娱乐休闲功能景观是以洗墨池为代表,由官府、民间修建的风景名胜或池苑园林。上述多种功能兼有谓之混合景观,也可称之为多功能景观,换言之,当景观的两种功能或多种功能并存且同时成为该景观的总体态势时,则视其为混合景观,如兼具政治与军事功能的城墙等。<sup>②</sup> 由于受到文献搜索或存留的制约,某些地理实体难以获取足够的信息,无法确切地进行功能判定,暂将其搁置为未定项,统称为X功能,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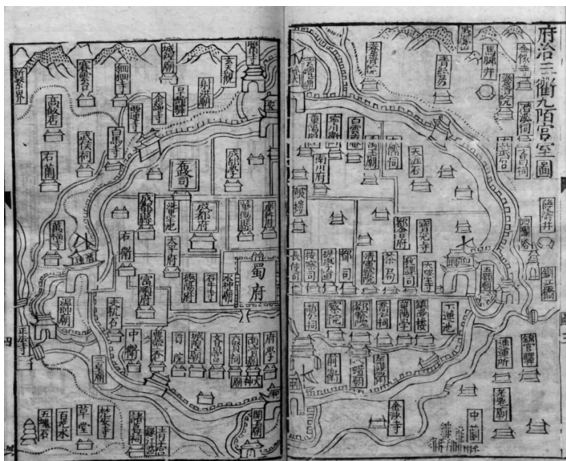


图1 《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

说明:因整理本天启《新修成都府志》的文图过于简略,不利于深入研究,本文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天启《新修成都府志》所载舆图

① 参见安介生、周妮:《江南景观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4页。

② 参见熊梅:《清代晋南乡镇演变研究》,《干旱区资源环境》2012年第10期。

经过整理与分析,《宫室图》所绘文化景观包含两大类:单功能景观 89 个,其中政治景观和宗教景观在地图上分庭抗礼,各自占据重要位置,这一点与绝大部分明代方志舆图一致。娱乐休闲功能景观数量可观,社会福利功能景观、教化功能景观数量较少,且缺乏纯粹的经济功能景观;多功能景观 6 个,分别为兼具政治与军事功能的城墙、4 座城门和兼具宗教与经济功能的大慈寺。X 功能的景观有两处——青纸房和高饭店,就收集到的现有资料看,暂时判断为带有政治功能的景观以及功能不详的景观(见表 1)。

表 1 《宫室图》文化景观类型统计表

功能类型		景观	数量
单功能	政治功能	蜀王府、成都府、德阳府、太平府、富顺府、南川府、庆符府、都会府、成都县、华阳县、都察院、布政司、长使司、按察司、提学道、清军察院、察院、茶局、税课司、早馆驿、锦官驿、迁运所	22
	宗教功能	城隍庙(两座)、金像寺、宝光寺、昭觉寺、金沙寺、回回寺、正法寺、西莲寺、金绳寺、白马寺、石牛寺、万福寺、梵安寺、潜溪祠、文昌祠、乔公祠、赵公祠、武侯祠、诸葛祠、六贤祠、老鬼庙、五显庙、八蜡庙、南淩庙、火神庙、关王庙、水神庙、三皇庙、温帅庙、射洪庙、玄坛庙、愚王庙、真武宫、青羊宫、文昌宫、白云庵、重阳观、赛云台	39
	军事功能	都司、中卫、右卫、前卫、左护卫、宁川卫	6
	教化功能	府学、华阳学、成都学、贡院、大儒祠	5
	娱乐休闲功能	天涯石、支机石、马脚井、薛涛井、五块石、回澜塔、下莲池、洗墨池、右苑、中苑、鼓楼、镇边楼、草堂	13
	社会保障功能	丰宁仓、养济院	2
	交通功能	缘江路、锁江桥	2
多功能	政治军事功能	城墙、迎晖门、清远门、中和门、大安门	5
	宗教经济功能	大慈寺	1
X 功能	带有政治功能	青纸房	1
	具体功能不详	高饭店	1

说明:《宫室图》所绘景观不止 99 个,部分景观仅有图示而无文字标注,表 1 主要按有文字标注的景观作分类。此外,“城墙”虽无文字标注,但于城池发展有重要意义,故列入景观分类

## 1. 《宫室图》的政治景观

蜀王府居于《宫室图》的中心位置，德阳王府、太平王府等6座王府分列在蜀王府周围，藩王府的设置是明代分封宗藩之制的反映。洪武初年，明太祖为“上卫国家，下安生民”而“建藩屏”，使其子“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永乐年间，发动靖难之役而登上御座的燕王朱棣，唯恐其他藩王步自己后尘，对诸王分封制度大加改革，这样明朝就形成与其他王朝不同的宗藩制度，即分封于各省各府的皇子，虽“外实无事权”，却以“王府之尊，而居于外郡”<sup>①</sup>。据学者考证，明蜀王府的面积约占明代成都府城面积的五分之一<sup>②</sup>，其庞大的建筑规模对明代成都的城市营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王府位于成都大城中心，王府外围萧墙，加之最外围的城墙，成都府城由此形成内、中、外三重城垣。<sup>③</sup> 宋人李石言：“成都官治多胜处，端倚此山（岷山）向背为重”<sup>④</sup>，证明成都此前的官署多摆布在城北，而明代成都官署多布于城东，这极有可能是由于蜀王府占据了成都很大一部分城市空间，使得明代官府不再因前址修建而向城东迁移。

明代州县衙署的建筑设计是以地方长官为中心，建署服务于政治<sup>⑤</sup>，公署不光要宽广宏大，更要“建表率，肃观瞻而敷王政也”<sup>⑥</sup>。由是可见，公署修建的首要目的在于体现皇权威严尊崇，以此震慑一方。但明初成都受元末战乱影响，处于“当盛之秋”，经营困难，在政治格局的影响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下，明代成都公署的修造，展现出与明代定制的差异性——不仅追求“壮观”，更要“因时制宜，不劳不伤”，出号颁令、发政施仁、追求行政效率才是其首要目的。<sup>⑦</sup>

## 2. 《宫室图》的宗教景观

宗教场所的初建是为报功德，乃“国典至重”。<sup>⑧</sup> 宗教景观和政治景观二者在《宫室图》中景观总数的占比超过六成，这一点和绝大多数明代方志城池图一致。宗教场所的兴建和管理与地方政治密切相关。

首先，城隍神和地方官的设置，即葛兆光所说的以“阴间官配阳间官”。明代成都城的4个瓮城，建有五显庙、温帅庙、关王庙和玄坛庙。同时可见两座城隍庙，分别在贡院以东和府治以北。城隍的重要性，在明代尤为凸显，自洪武皇帝始，中央和地方对城隍神的崇拜经历政府有意识的制度化和政治化，亦是城隍庙兼有部分政治功能的原因，而表现在方志舆图上就是，“城隍庙和阳间的官衙门一样，分庭抗礼，各自占据了重要的位置”<sup>⑨</sup>。

其次，帝王与藩王对宗教信仰极力尊崇。以《宫室图》所绘真武庙为例，郑民德指出，明代帝王不啻在全国各地建置真武庙，遣官祭祀，而且屡颁诏令强化真武信仰的权威性、正统性，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明分封宗藩之制》，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82—686页。

② 参见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第87页。

③ 参见刘大谟：嘉靖《四川总志》卷1《藩封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2册，第22页。

④ 袁说友等编：《成都文类》卷28《转运司爽西楼记》，赵晓兰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第552页。

⑤ 参见柏桦：《明代州县衙署的建制与州县政治体制》，《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

⑥ 王纶布修，劳清纂：康熙《兴宁县志》卷2《规制志》，清康熙二十年（1681）刻本。

⑦ 参见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城郭》，第54页。

⑧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祠庙》，第58页。

⑨ 葛兆光：《古舆图别解——读明代方志地图的感想三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

巩固与提升其在国家神灵结构中的地位，展现明朝对真武信仰的尊崇。<sup>①</sup>昭觉寺乃成都地区的大刹之一，明太祖认为智润禅师“戒行高洁”，命蜀献王亲迎智润禅师住持昭觉寺，并赐号“光照禅师”，反映出明代成都皇室对宗教的高度重视。<sup>②</sup>

再次，地方官府主动参与宗教建筑的修建。成都府治北门外的射洪庙乃蜀献王进驻成都时，为祭祀射洪土神陈子昂而修建。府治东的禹王庙，在万历年间，先后由都御史罗瑶、王廷瞻，御史何汝成、虞怀忠经始，布政使刘庠、李江发帑金，最后属成都知府张大器修建而成。此外，据方志记载，青羊宫、东岳庙、天将庙等，也由官府或蜀府出资修建<sup>③</sup>，可见明代成都城很多的祠庙寺观的落成均与地方官府有关。

明代政府还在府一级行政单位设置僧纲司和道纪司，专管当地佛教和道教事务。《明史·职官志》记载：“府僧纲司，都纲一人，从九品……府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俱洪武十五年置，设官不给禄。”<sup>④</sup>方志记载：“僧纲司，在大慈寺；道纪司，在青羊宫”<sup>⑤</sup>，可见官府对于宗教事务的插足。

### 3. 《宫室图》的文教景观

文教事业的开展是一件厚风俗、巩固国家元气的大事，天启《新修成都府志》甚至将“学校”的记载列在“城郭”和“公署”之前，可见方志编修者给予文教事业的高度重视。《宫室图》对于文教场所的景观标识共有5处：府学、华阳学、成都学、贡院和大儒祠。

府学、县学的修建有利于促进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古代读书人大多抱有“学而优则仕”的想法，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走上仕途是大部分读书人的出路，而地方政府新修府学、县学，也是为了向中央输送人才，以宣扬政绩。

除府学、县学外，明代成都的书院勃兴，亦是成都文化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四川书院史》较为翔实地梳理了明代成都书院的发展：弘治年间，巡按御史姚祥在杜甫草堂附近开设浣花书院；嘉靖十二年（1533），成都草堂浣花书院旧址重修少陵书院，正德时，垣败屋颓，布政使熊相命成都知县张纶重修；同时，重建了石室书院；正德十三年（1518），提学僉事王廷相建大益书院，嘉靖三年四川巡抚许廷光修，嘉靖十三年巡按熊爵等重修。<sup>⑥</sup>书院的规模虽无官学庞大，但一般也有讲堂、藏书楼和斋舍，还辟有祭祀先师圣贤的堂庑。<sup>⑦</sup>

《宫室图》所绘的“大儒祠”，由“大益书院”更名而来，此次更名是明代后期政府禁毁书院的反映。书院教学由于较少受官府干预，因此学术氛围比较浓厚，学生思想活跃、关心时政、臧否人物。然而明代后期，朝政腐败，权臣当道、宦官窃持国柄的现象日趋严重，执政者无法容忍民间这种自由谈论国是的行为，因此对民间书院进行大规模禁毁。<sup>⑧</sup>从现有资料来看，成都的书院也受到了此次禁毁的影响。《大儒祠记》谈及，万历七年（1579），“故相张江陵（张居正）

① 参见郑民德：《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真武大帝信仰》，《中国道教》2020年第4期。

② 参见释中恂：《重修昭觉寺志》卷1，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

③ 参见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城郭》，第58—60页。

④ 张廷玉：《明史》卷75《职官志》，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⑤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公署》，第55页。

⑥ 参见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9—80页。

⑦ 参见张学君、张莉红：《成都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46—248页。

⑧ 参见明中后期4次禁毁书院，分别发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嘉靖十七年、万历七年和天启五年（1625）。见嵇璜撰：《续文献通考》卷50《学校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夏燮：《明通鉴》卷67《纪六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9页。

尽毁宇内书院，毋使诸生聚议，大益书院亦在毁中”，直到万历十五年，虽然张居正已去世5年，但其禁毁书院的影响依然存在，“大益书院”为此不得不更名为“大儒祠”，可见其遗患之深远。<sup>①</sup>

#### 4. 《宫室图》其他景观

##### (1) 单功能景观

军事功能景观由都指挥使司和成都左卫等主要负责军事管理的机构组成。明朝于洪武四年(1371)在成都置成都右、中、前、后、左五卫，洪武八年设四川都指挥使司，除成都左卫在正统至景泰年间(1436—1457)被废除外，其余都司卫所均与明朝共始终，其辖区亦无较大变动。有关四川都司卫所制度的沿革，郭红等学者已有详细考证，此不赘述。<sup>②</sup>

娱乐休闲功能的景观指并不为政治机器运转和人类日常生活所必需，但能够满足时人内心和精神需求的场所，游客骚人于此休闲娱乐、吟诗作赋，“履其迹，思其人，虽千古犹同堂也”<sup>③</sup>。部分古迹(如薛涛井、回澜塔等)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成都的重要景点。

社会保障功能和交通功能景观作为官府基本工程，是地方主政者执政能力的反映，因此，这两种景观与政治、宗教、文教类景观一样会被重点标示，以展现“政府的全能”<sup>④</sup>，在明代方志城池图中频繁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地方官员展现政绩的载体。

##### (2) 多功能景观

《宫室图》的多功能景观有两类，一是带有政治军事混合功能的城墙和城门，一是带有宗教经济混合功能的大慈寺。

正德《四川志·城池》记载：“(府城)因宋元旧城而增修之，包砌砖石，基广二丈五尺，高三丈五尺，复修堤岸以为固。”<sup>⑤</sup>天启《新修成都府志》记载，“蜀城敝久，今则补旧增新，楼阁壮丽，雉堞雄严，屹然天府之胜矣”<sup>⑥</sup>，可见明代成都城墙气势之挺拔。历史时期，城墙确实发挥着军事防御设施的作用。天启年间，布政使朱燮元、周著等人，在兵力明显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为抵抗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对成都发动的军事进攻，率兵分门固守，死守成都城，多次挫败其进攻，足见成都城墙防御功能的显著。但成都地处西南内陆，无须直面北方游牧民族和沿海倭寇的军事威胁，而来自川内的流民起义、地方叛乱，所波及的多在灌县(今都江堰)、茂州(今汶川茂县等一带)等周边地区，成都城并未受到冲击。所以有明一代，长期安定始终是成都社会环境的主旋律，作为军事设施的城墙对于明代成都城而言多系有备无患。李孝聪指出，城墙反映出阻隔的意义，将城市与乡村分割开来。<sup>⑦</sup>筑墙意味着城乡分区，城门又成为联结城乡的纽带，城内外百姓在官府规定的时间内进出城市，在城门附近定期开展商品贸易，促成有序的政治管理，赋予城墙日渐突出的政治功能。换言之，明代成都的城墙作为“威权的象征”，发挥其政

① 耿定力对此事的记载时间为“万历丁丑(五年,1577)”，此处应是耿定力的笔误，时间当为万历七年。见常明、杨芳灿：嘉庆《四川通志》卷80，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木刻本。

② 参见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5—448页。

③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宫室》，第61页。

④ 葛兆光：《古舆图别解——读明代方志地图的感想三则》。

⑤ 熊相：正德《四川志》，转引自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第84页。

⑥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城郭》，第51页。

⑦ 参见李孝聪：《形制与意象——一千五百年以来中国城市空间的传承与变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中华书局，2010年，第518—536页。

治功能乃是常态，而作为防御设施发挥军事功能却是异态。<sup>①</sup>

作为“国典至重”“以报功德”的寺庙<sup>②</sup>，大慈寺的宗教功能无需赘言。而寺庙除了是百姓提供祭祀祷告的场所之外，还会开展寺集庙会这种特殊形式的商品贸易。《蜀中广记》记载：“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sup>③</sup>可见大慈寺前市场交易之繁荣景象，亦是其兼具经济功能的原因。

### (3) X 功能景观

《宫室图》的 X 功能景观有两处，一是青纸房，一是高饭店。

据现有史料记载，明代青纸的主要用途是制作进贡所用的川扇和官府户籍造册用纸。史书记载：“今川扇一种，以青纸为地，画人物花鸟于上。”<sup>④</sup>可见青纸为川扇制作的原材料，而明代川扇作为名扬海内的手工艺品，多进贡皇室，较少流入民间。<sup>⑤</sup>《万历野获编》卷 2《四川贡扇》记载，明初四川所贡川扇数额为 11540 柄，至嘉靖时期又屡次加造 2900 余柄，“以供新幸诸贵宾用”<sup>⑥</sup>。除制作川扇外，青纸还专用于地方官府登记户口。明代用以登记户口的账册，进呈户部以黄纸为面，“布政司、府、州、县册用青纸面”<sup>⑦</sup>。由此可见，青纸房在明代具有显著为政府机关服务的职能，但所造之纸是否完全用于官府？是否有部分进入了商品流通？由于史料暂且掌握有限，无法确切进行功能判定，故暂将“青纸房”列为 X 功能景观。

店，“犹‘站’，常用作集镇之名”<sup>⑧</sup>。民国《华阳县志》卷 1《场镇表》记载：“回龙场……俗称高饭店”<sup>⑨</sup>，则高饭店曾是华阳下辖的一处场镇，既是场镇，必有场期。《双流县志》载高饭店居民在民国时期每十天赶场三次，场期为农历一、四、七。<sup>⑩</sup>但民国时期高饭店所具有的经济功能并不一定在明代也同时具有，那么，高饭店是成都府下辖的一处普通场镇？但如若只是一般意义的以行政中心为主要功能的普通场镇，为何不见四郭其他处绘有同样性质的地理标识？显然，高饭店具有其他非政治性质的功能，是城郭之外的商品交易场所？还是城乡结合部的一处大众休闲娱乐之地？在设法搜寻的资料中暂时尚未发现与高饭店有关的史料，实难判断其具体承担的功能。

## 二 《宫室图》的绘制特点

从《宫室图》可见明末成都城市的平面布局，舆图方向上北下南。图符带有中国传统山水

① 参见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9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 3《祠庙》，第 58 页。

③ 按，《蜀中广记》谓此段引文来自《胜览》，即《方輿胜览》，回查《方輿胜览》，文字记载与此略有不同。见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輿胜览》卷 51《成都府路·成都府·风俗》，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 年，第 906 页；曹学佺：《蜀中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29 页。

④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 56《外纪二》，《成都旧志》，成都时代出版社，“通志类”，第 8 册，第 882 页。

⑤ 参见陈世松、李映发：《成都通史（元明时期）》，第 270—273 页。

⑥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26《四川贡扇》，清道光七年（1827）姚氏刻同治八年（1869）补修本。

⑦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 20《户部》，明万历内府刻本。

⑧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 3 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第 1213 页。

⑨ 陈法驾、叶大镛：（民国）《华阳县志》卷 1《场镇表》，民国 23 年（1934）刻本。

⑩ 参见中共成都市双流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双流县志 1911—1985》，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年，第 252 页。

绘画的烙印：以“∧”勾勒山峰，双曲线代表河流，间断曲线表示区划，锯齿状线条连缀城墙，平行直线表示街巷；采用象形化、通俗化的建筑符号代表地理场所，并以单线或双线矩形框内嵌文字的方式指示地名。府图以城为中心，兼绘部分四郭，城墙四至绘有大安、清远、迎晖和中和四座城门及瓮城。综观《宫室图》的方位和绘制方式，呈现出以下特点。

### 1. 突出中正和谐

荀子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sup>①</sup>，可见“以中为尊”是礼制的内在要求之一。秦红岭认为，中国古代都城方位布局的核心在于将宫殿置于都城中央显赫位置，以展现其威严，这一点也适用于明代成都城。<sup>②</sup>读图可见蜀王府位于成都城中心，布政司、成都府等重要的公署也向中心集聚，而茶局、驿站和大部分宗教景观等则处于城市边缘甚至城外。城池布局秩序严谨，除城墙部分城楼（为顺应城池的走向）稍有倾斜外，所有景观都被刻画得异常“中正”，尤其是街道网络。《宫室图》中有两条正东西向的大街贯通全城，正南北走向亦有若干街道，力图塑造出一种“中正有序”之感。

对比近代以来实测的成都地图，明显发现“中正”并不符合明代成都城的实际情况。成都的主轴线和大部分建筑朝向并非正南正北向，而是由北偏东约30度<sup>③</sup>，此格局自开明王朝始，一直延续到元末明初。而明王朝营建蜀王府时，则将主轴偏心的轴线布局改为了正南正北向的中轴，这一布局确立后便一直统领着成都的城市发展。<sup>④</sup>换言之，整个成都城的街道网应当是正南北向、北偏东向和其余一些细小的街道组成的三套路网，其建筑的朝向也并非全都坐北朝南。当时的地方主政者不可能不清楚这种情况，而这刻意为之的绘制方式反映了绘图者可能受到儒家“尚中”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和谐”。汪德华认为，中国古代追求塑造一种“集约式城市”，即是将人筑的城池与自然山水、社会秩序结构系统集约起来，成为天人合一概念的最具体的理想组成。<sup>⑤</sup>成都城“沃野千里而外，皆山也。经纪于益州之奥壤，皆水也”<sup>⑥</sup>，城中布政司内的武担山、闾宫的古柏、市桥的官柳等点缀城市。《宫室图》北部用“∧”勾勒出威风山，双曲线勾画的府河由城南穿城而过，南部用树状的象形画法描绘“中苑”，自然景观与政治、宗教等文化景观有机结合，相互构成这一行政单元内的和谐景象。

由上可见，《宫室图》的绘制方式受到儒家理念的极大影响，与明代朱元璋建国后力图恢复儒家秩序、追求社会和谐的国家意志密切相关。明朝建立初，朱元璋竭力强化礼治，将儒家理念与治国理念相结合，致力于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之营造。<sup>⑦</sup>如，由朱元璋主持编撰的以垂训天

① 荀况撰，杨倞注：《荀子》卷19《大略篇》，清抱经堂丛书本。

② 参见秦红岭：《儒家伦理文化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影响》，《华中建筑》2007年第12期。

③ 北偏东朝向的形成，学界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该朝向一方面是由于成都平原两侧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特征，由此契合山脉走向，另一方面是成都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垂直偏东的朝向更有利于采光、集热与通风；亦有学者认为成都斜向街道对准冬至日的日出方位，源自原始时期太阳崇拜的观念。参见刘聪：《成都街道斜向成因再辨》，《巴蜀史志》2020年第3期。

④ 参见李旭、许凌、裴宇轩、冉小刚：《城市形态的“历史结构”：特征·演变·意义——以成都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8期。

⑤ 转引自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⑥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2《山川志》，第27页。

⑦ 参见汪火根：《朱元璋治国思想初探》，《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下、仪范世人的《皇明祖训》就贯彻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等思想。<sup>①</sup>在纂修《洪武京城图志》之时，朱元璋并未让“掌舆图”的兵部主持，而是交由“掌天下礼仪”的礼部，以此强调其政权之正统性，以彰大明之威等。<sup>②</sup>方志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地方化<sup>③</sup>，方志绘编者顺承和遵循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所以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中处处浸透着这样的理念——《城郭》篇中“王公设险以守国，孔子彖之，城郭之义重矣……人心之守固于金汤，人和尚焉”；《学校》篇中“夫国家元气培于人文之一脉，是以《周官》九两六俗皆聊之师焉，于以淑人心，厚风俗，巩固国家元气……学校之设詎不重哉”；《公署》篇中“故公署之设非徒壮观，于以出号颁令，发政施仁，至宏钜矣”等，均是儒家“和谐”“教化”“仁政”等思想的具体体现<sup>④</sup>，而《宫室图》的绘图者突出塑造“中正”“和谐”之感也高度契合明王朝恢复儒家秩序、追求社会和谐的国家意志。

## 2. 凸显等级尊卑

范德指出，明代地方志中的行政单元背后透露出等级制度的安排，即首都在最上层，然后自上而下依次是布政使司、府、州、县。<sup>⑤</sup>自周代始，中国不同等级的城市在规模上就有着严格的定制。史书记载周代“公之城方九里，官方九百步；伯之城方七里，官方七百步；子、男之城盖方五里，官方五百步”<sup>⑥</sup>，天子王城最为尊贵，因而规模最大，诸侯、大夫次之。至于明代，诸侯、大夫之地早被府、州、县所取代，但等级观念依旧没有改变，两京规模远大于地方，而成都作为四川承宣布政使司的首府，其城池规模又大于其下辖的州、县。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所载的另一幅《府治合属郡县总图》（见图2）是窥探等级制度下府级行政单位的极好例子。作为四川首府的成都，该图对其刻画的最为细致，不仅勾勒出城市的大致轮廓，还将部分政治景观绘入城中。而次一级的州、县级行政单位，则用较小的图标予以标示，而地位更低的驿站、寺庙等景观便不予绘制，仅采用文字的形式予以标注。这种用大图标代表较高的行政单元而用小图标代表较低的行政单元的绘图习惯，反映出绘图者竭力向世人展现一种清晰的等级世界。

城市的规制展现出等级差异，其内部建筑的规模同样受到等级尊卑思想的影响。通观现存明代方志舆图，可以发现极少数明代县境城池图会对其辖区的部分村庄、街坊、集镇等反映民众生存空间的景观进行标示，而随着行政等级的上升，府一级行政单位的城池图则充斥着政治景观和宗教景观，鲜有绘制民众生存空间的景观情况。成都城内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位于城中心的蜀王府。蜀王府建于明初，明王朝营建蜀王府的重要目的就是“壮丽以示威仪”，供四民所瞻仰<sup>⑦</sup>，王府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五尺，萧墙之中有十余座宫殿，建筑巍峨雄伟，占据明代成都城将近五分之一的面积，后来万历年间的火灾虽对王府造成巨大破坏，但并不影响其地位为所有成都建筑之最。因此在《宫室图》中，地位最高的蜀王府自然被予以最重的笔墨，地位较低的公署、

① 参见杨静：《明太祖齐家治国理想研究——以〈皇明祖训〉为中心的探讨》，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2页。

② 参见申陈：《从明代方志地图探讨南京城市空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0—11页。

③ 参见潘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④ 参见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建置志》，第50、51、54页。

⑤ 参见范德：《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⑥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82，民国20年（1931）湖北筵湖精舍递刻本。

⑦ 参见胡开全：《壮丽以示威仪——明蜀王府建筑群的文化内涵》，《文史杂志》2018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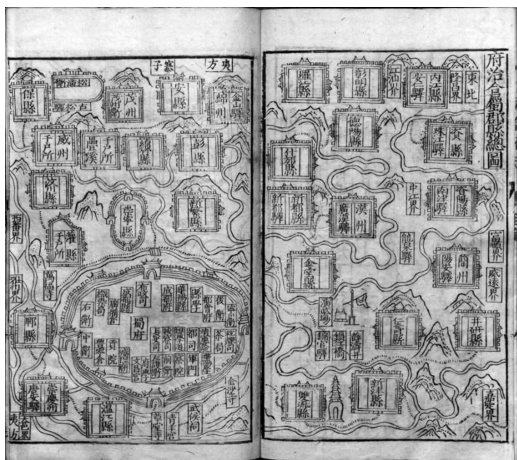


图2 《府治合属郡县总图》

说明：图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天启《新修成都府志》，  
舆图方向上北下南

寺庙等景观则被绘制得细小且简单，地位更低的庶民生活空间则直接被绘图者排除在外。由此可见，以大为贵、以高为尊的礼制思想深刻影响着成都城市的营建和建制规模，舆图绘制者也正竭力构建这种凸显等级尊卑的世界。

### 3. 展现仿生取象

《宫室图》的轮廓酷似“龟形”：不规则的椭圆形城墙构成“龟”的外形，城池西南角和东北角二亭“俗传像龟之首尾”<sup>①</sup>，迎晖、中和、清远、大安四门和瓮城构成龟的四肢，东西、南北向的通衢大道如龟壳纹路一般嵌入城市。成都“龟形”城池的形象被绘图者塑造得栩栩如生。甚至到清末民初之际，利用实测技术绘制而成的《新测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似乎依然保留有这一“龟形”印象。这究竟是绘图者臆想还是城池本身的巧合呢？

其实，成都城早在明代以前就被称为“龟城”。唐人王徽在《创筑罗城记》中说道：“蜀城既卑且隘，象龟形之屈缩”<sup>②</sup>。唐宋之际，民间产生了大量与“龟城”有关的诗歌<sup>③</sup>，在世人眼中，“龟城”就是指代的成都城。那么，为什么成都城被叫作“龟城”呢？因为“成都城龟形，其下皆甃以石”<sup>④</sup>，似乎是人为刻意的修建。相传张仪初建成都城时，屡坏而不能立，后有巨龟出于江，周行旋走，遂依龟迹筑之，城乃得立，所掘处乃大池，龟伏其中，成都遂有龟城之称。<sup>⑤</sup>

① 熊相：正德《四川志》，转引自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第84页。

② 王徽：《创筑罗城记》，袁说友等编：《成都文类》卷24，第496页。

③ 如唐人戎昱在《成都暮雨秋》中吟咏“九月龟城暮，愁人闭草堂”；宋人薛季宣《张村》有“青城足跻攀，那染龟城尘”等名句。参见曹寅编：《全唐诗》卷1，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吴之振编：《宋诗钞》卷80，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李玉宣等：同治《成都县志》卷16《纪事志》，《成都旧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通志类”，第11册，第789页。

⑤ 参见袁以坝纂修，杨芳灿续修：嘉庆《成都县志》，《成都旧志》，“通志类”，第10册，第15页。

中国古代确实有不少城池被塑造成“龟形”，如战国时期的吴大城、东魏的邺城南城、唐宋时期的赣州古城等，这种仿生学筑城理念的背后蕴含着筑城者对城市的美好祝愿，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理智慧。但需指出的是，龟形城市营造的背后逻辑是筑城者将城市“取象”于某种生物的形象与灵气，“取象”的古城因此具备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即古城的“仿生”<sup>①</sup>，换言之是筑城者先有将城市塑造成“龟形”的设计思路，然后照此思路将城市塑造成“龟城”，筑城者的主观设计对于城市形象起决定性作用。如，伍子胥依照“神龟八卦模式”进行规划，将吴大城塑造成“象天法地”的龟城形象。<sup>②</sup>那么，成都城的“龟城”形象也是源于筑城者的设计理念？结合张仪初建成都城的传说看，似乎受了“龟”的指引而非人为的规划。显然，这种解释很难使人信服。

从建城的实际环境看，成都龟形的城池轮廓其实是受制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成都城址位于平原，四周为高山或低山、丘陵所包围，在李冰修筑都江堰之前，成都地区排水极为困难，沼泽极多，土质松软。《城隍庙记》载，“蜀地土惟涂泥，古难版筑”<sup>③</sup>，所以张仪筑成都时才“屡坏而不能立”，后顺江山之势，城乃得立。由于筑城时是契合山川形势，自然不可能是规整的矩形，所以成都的城墙轮廓并非常规的方形或圆形，而是不规则的椭圆形，曲缩如龟，“龟城”得名当源于此。《九家集注杜诗》记载，“初筑此城，虽曰附龟，盖以顺江山之势，正即为斜矣”<sup>④</sup>，表明至少在北宋以前，世人已认识到自然形势对于成都城的塑造作用。张仪筑大城后，又筑少城，形成东西二城倚背之势，此城市形制一直延续至唐代，其间虽有修葺，但无重大变迁。<sup>⑤</sup>晚唐高骈扩筑罗城，将郫江改道走城北门外、东门外，又在西南外重新开壕，形成全城环江的布局。<sup>⑥</sup>明代成都修筑大城时，受此地理环境之约束，城池只能在今府河和锦江之间修筑，形成“内江（府河）之水由城南，外江（锦江）之水由城北，东流至濯锦桥而合”的城市形制。<sup>⑦</sup>由此可见，自秦时张仪筑城始，直至明代，自然环境尤其是山川形势始终约束着成都城的城市轮廓，使其为不规则的椭圆形。

由于城市外部轮廓不能达成传统筑城理念中的“规整”形态，绘图者力图通过主要街道和坊区实现地图视觉的“方正”感。查阅现存明代绝大部分方志所载舆图<sup>⑧</sup>，明代府、州、县的城池图通常被命名为“府境（治）图”“州治图”或“县境（治）图”，而成都城却称之为《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衢”和“陌”意为四通八达的街道，突出强调了纵横交叉的网格感，从命名上展现了“龟城”内部的井然有序。由于史料的散佚，明代成都街道网已难以窥之全豹，仅存部分街名，而《宫室图》难能可贵地展示了城市内部的交通干线——以蜀王府为中心，两条正东西向的大街贯通全城，正南北走向亦有若干街道，再辅以各种坊巷。城内外官衙相望，寺观密布，布局严谨有序。

① 于希贤：《中国古城的仿生学文化透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② 参见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哲理研究——以龟形城市格局为例》，《中国名城》2010年第8期。

③ 段全纬：《城隍庙记》，转引自袁说友等编：《成都文类》卷32，第622页。

④ 杜甫撰，郭知达注：《九家杜诗集注》卷7《石犀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参见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第32页。

⑥ 参见罗开玉：《古代成都城的风水学考察》，《文史杂志》1993年第2期。

⑦ 参见刘大谟：嘉靖《四川总志》卷1《建置沿革》，第15页。

⑧ 参见查阅的舆图为“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共139册，216种方志所载舆图。参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1—1966年；“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

可见,成都龟城称谓源于神话,本质却是地理环境的原因,但人们受到趋吉避凶心态的影响,“龟化之异盖自古而然矣”<sup>①</sup>。在世俗生活中,传奇色彩的民间传播力广泛而持久,人们愿意相信成都筑城是受神龟指引,为成都城蒙上一层神秘主义色彩,并将之不断强化,形成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sup>②</sup>绘图者作为本土文化的传承者,自觉或不自觉将龟城意象诉诸于笔下,加深了仿生取象的主观寄寓,但拨开这层充满想象的面纱,《宫室图》所塑造的仿生建筑感背后实则隐藏着自然地理环境对城市形态的深刻影响。

### 三 《宫室图》的信息传达

舆图作为“文化思维的产物”,“不仅表达作者的思想意图,而且反映作者对生活空间的感知和创作时代的社会需求”<sup>③</sup>。因而,我们决不能忽视绘图者对明末成都城市空间的认知以及通过舆图传达的信息。

#### 1. 暗藏成图年代

孙靖国指出,由于舆图地理信息的复杂性和层累形成的可能性,所以对舆图成图年代的推导必须要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进行探究。<sup>④</sup>由于《宫室图》并未标注绘制者和绘制时间,该图虽载于天启《新修成都府志》,但该图却可能在方志编修之前便已由他人制成,不能肯定《宫室图》和方志的成书时间一致,这为判定《宫室图》的成图年代造成了很大困扰。<sup>⑤</sup>天启《新修成都府志》于泰昌元年(1620)年底编修完成,天启元年印刷。可见,该图最晚的成图时间不会晚于泰昌年间。据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凡例》记载:“成都旧志,今总无考。因旁搜史传,合郡县之散见者博采而编集之,以存掌故”<sup>⑥</sup>,卷1《成都舆图》写明:“爰绘总图,而郡城衢陌以次附焉”<sup>⑦</sup>,可见《宫室图》并非沿用前代旧图。《宫室图》中绘有“锁江桥”,据考证,“锁江桥”即为“洪济桥”,《新修洪济桥回澜塔碑》记载此桥于万历癸巳年(1593)菊月由余一龙经始,是年十月落成。<sup>⑧</sup>据此可知,《宫室图》的成图年代约在万历二十一年至泰昌元年之间。

① 杜应芳辑:《补续全蜀艺文志》卷32《动植纪异谱》,明万历刻本。

② 参见朱晓舟:《浅谈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与中国历史的神话化》,《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5期。

③ 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读书》1997年第7期。

④ 参见孙靖国:《〈江防海防图〉再释——兼论中国传统舆图所承载地理信息的复杂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⑤ 《宫室图》虽载于天启《新修成都府志》,但该图却可能在方志编修之前便已由他人制成,不能肯定《宫室图》和方志的成书时间一致。

⑥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凡例”,第5页。

⑦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1《成都舆图》,第1页。

⑧ 关于“锁江桥”的落成时间,史书记载不一。明人李长春在《新修洪济桥回澜塔碑记》记载锁江桥落成时间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天启《新修成都府志》记载的建桥时间为万历二十三年,而民国修订的《华阳县志》所载其创建时间为万历二十五年。各家时间说不一,但内容实则一致:建桥者是布政使余一龙,桥为石材拱式九洞,南岸建有回澜塔,目的是“以锁水口”,故而又叫锁江桥。李长春万历二十一年为官,建桥两年后为文,天启《新修成都府志》此称二十三年,系误以撰文之年为建桥年。而民国《华阳县志》成书时间距明代尚远,其可信程度不如明代碑记,所以锁江桥的落成时间当以碑记为准,即万历二十一年。参见李长春:《新修洪济桥回澜塔碑记》,转引自曾晓娟:《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文学卷)》,巴蜀书社,2017年,第669—671页;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关梁》,第62—65页;陈法驾、叶大镛:(民国)《华阳县志》卷1《津梁表》,民国23年(1934)刻本。

## 2. 反映公署发展

明代是成都官署布局变化的关键时期。观察《宫室图》可见成都公署的布局情况：承宣布政使司位在府城西北隅，成都府、华阳县等治所因袭宋代故基，位在城北。巡抚都察院、都司等明代新设立的公署布于城东。而宋代成都官治多在城北，《宫室图》中府廨公署多集中于城东和城北地区，尤以城东为多。将明代成都可考方位的公署逐一列出（见表2）<sup>①</sup>，对比文献记载，二者方位无误，可见《宫室图》所绘公署的布局反映了明末成都城市的政治中心呈现出自北向东的迁移趋势。<sup>②</sup>

表2 明代成都公署的布局

方位	公署	出处
东	巡抚都察院、按察司、察院、抚院、督院、都司、清军察院、总兵府、税课司、僧纲司、锦官驿、迁运所、宁川卫、华阳县治	《大明一统志》、嘉靖《四川总志》、天启《新修成都府志》、雍正《四川通志》、《成都街名琐记》
西	成都县治、成都右卫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
南	盐课提举司、成都前卫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
北	早馆驿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
东北	惠民药局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
西北	布政使司	嘉靖《四川总志》
东南	广都水驿、木马水驿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
西南	成都中卫、道纪司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

说明：关于公署方位的记载，史料多未言明，仅载相对位置，表格内容结合多本方志载录，参照而成

## 3. 折射宗教演化

段玉明指出，佛寺的兴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sup>③</sup>随着成都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城市佛教寺院的数量也呈现增长趋势。《益部谈资》记载，“蜀中水陆舟车所经，凡有岩石，莫不镌佛像”<sup>④</sup>，可见蜀地对佛教文化的崇敬。明代四川方志中不乏关于佛寺的收录，方志的记载虽未必全面而准确，但作为官方或地方的记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用来推测佛寺的发展情况。<sup>⑤</sup>据方志记载，明初成都府的佛寺仅有11座<sup>⑥</sup>，经过逾百年的发展，至天启年间，成都府

① 参见李贤等：《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041页；刘大谟：嘉靖《四川总志》卷1，第22—40页；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第54—57页；雍正《四川通志》卷28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陶亮生：《成都街名琐记》，成都市群众艺术馆：《成都掌故》，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② 参见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第104页。

③ 参见段玉明：《明清巴蜀佛教寺院研究》，《普陀学刊》2019年第1期。

④ 何宇度：《益部谈资》，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190册，第10页。

⑤ 参见段玉明：《明清巴蜀佛教寺院研究》，第151—204页。

⑥ 参见李贤等：《大明一统志》，第1042—1043页。

的佛教寺院已逾73座。<sup>①</sup>《宫室图》中佛寺的数量也占全图景观数量的14%，反映出明末成都佛教寺院的繁荣。

明代成都道教宫观的发展亦不容忽视。据方志记载，明初成都的道教官观有5座，至嘉靖时期增长到25座，此后发展较为缓慢，到天启年间只增加了4座。上述数据亦契合明代道教的发展趋势：明代统治者对于道教极力尊崇，至明代中叶，“仙宫佛院，成都颇盛……宫如青羊，俱不减两都规模”<sup>②</sup>，而嘉靖之后，统治者对于道教虽有利用之心，但扶植却相当有限，道教本身也处于衰退时期。<sup>③</sup>道教宫观总量在明代明显落后于佛寺的数量，同时出现了不少世俗信仰建筑。《大明一统志》记载有大禹庙和江渎庙<sup>④</sup>，至百年后的天启时期，《新修成都府志》记载的世俗信仰建筑已逾10座<sup>⑤</sup>，《宫室图》也绘有“关王庙”“火神庙”等供奉民间俗神的场所，这些均属道教神系，可见道教在明代成都的世俗化倾向。

#### 4. 难窥商业状况

前文对《宫室图》景观类型的分析可见图中缺乏纯粹经济功能的景观。绘图者的笔墨集中于政治、文教类的景观刻画，难以从图中窥见社会经济的行情。事实上，明代成都乃繁会九衢三市之地。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1《成都輿图》记载：“（成都）内外阘阘，今盛于古，不啻张乖崖所云十万家矣。其市廛以渊万商，其文明以繁科第，猗与盛哉。”<sup>⑥</sup>据统计，《宫室图》中所绘制的府学、大慈寺、青羊宫等数十座景观均在明代得到修缮或重建，方志中也不乏“国朝……重修”“本朝……重建”等记载<sup>⑦</sup>，若没有强大的经济能力作为支撑，重修工作定是举步维艰。同时，通过文献印证，“大慈寺”虽附着于宗教功能，实则为万商所聚的贸易之地。因此，如若考察一地经济之发展，我们则不能简单地只依赖于輿图信息。

其实，明代中后期的成都城在农业、商业、手工业方面都有恢复和发展。《都江堰记》载，明初以来，政府多次对都江堰进行修缮，以确保其正常的水利灌溉<sup>⑧</sup>，又设置屯田道，招募军民参加屯田，以缓解粮食供应的困难。地方官吏也劝课农桑，鼓励耕织，使得明代成都府在大片肥沃土地被王府、军队圈占的情况下，垦殖面积依旧达到了1.83万顷，人口也达到了数十万的规模。<sup>⑨</sup>《松窗梦语》载：“夫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珠玑金碧材木之利，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sup>⑩</sup>据此推之，明代中后期成都在全国商业发展中具有优势，客商逐利、西入成都赚取高额利润是很好地选择。同时，成都形成了发达的商品市场，除大慈寺外，还有蚕市、骡马市、七宝市、回回寺旁的羊市、城北的骡马市等。据《明英宗实录》载，在成都四门贩卖竹木的民众曾掀起一场请愿运动，原因是钞价高昂，请求将税钱的十分之一以竹

① 参见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第59—70页。

② 何宇度：《益部谈资》，第20页。

③ 参见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④ 参见李贤等：《大明一统志》，第1042页。

⑤ 参见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第58页。

⑥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1《成都輿图》，第1页。

⑦ 参见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1，第43—76页。

⑧ 参见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52《都江堰记》，第808—809页。

⑨ 参见张学君、张莉红：《成都城市史》，第193页。

⑩ 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清钞本。

木代替，户部遣官核查后发现确有此事，遂从之，足见竹木交易之盛况。<sup>①</sup>

成都别名锦官城，以桑蚕丝绢锦缎在全国享有盛名。四川官府特设织染局，蜀府也特设“锦坊”，为蜀王府和京城提供精美丝织品。《天工开物》记载，“凡……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sup>②</sup>，跨区域交易兴盛。

#### 四 《宫室图》中的不当之处

近代以来，受“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的影响，学界在21世纪之前往往关注体现“科学”和“准确”的舆图<sup>③</sup>，探讨的内容也多与舆图的“科学性”有关。通观《宫室图》的研究现状，可见此前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sup>④</sup>受传统绘图理念影响和雕版印刷尺寸约束的《宫室图》，和现代“科学”的地图相比，它似乎没有那么“准确”。但其实大部分舆图并不需要反映准确的地理认知，只要传达一种大致的地理空间形象和概念即可<sup>⑤</sup>，即使如此，通过查阅明清时期的成都史料，仍可发现《宫室图》中存有几处绘制不当与错讹之处。

##### 1. 薛涛井方位绘制有误

《宫室图》将薛涛井标示在府治正东。而《府志》记载“薛涛井旧名玉女津，在锦江南岸”<sup>⑥</sup>，王士禛提及“薛涛井在万里桥东锦江之滨”<sup>⑦</sup>。由此可见，天启年间的薛涛井就是今成都望江楼公园的薛涛井，其位置应在当时府治的东南而不是正东。

##### 2. 两处文字标注错误

“镇边楼”在《宫室图》东南位置，但史籍中并没有“镇边楼”的相关信息，却有一处“筹边楼”，由唐李德裕所建。<sup>⑧</sup>《蜀中广记》载：“《唐书》：‘李德裕建筹边楼于成都府治之西，四壁画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画其上。’……今筹边楼在都院之东掖。”<sup>⑨</sup>《宫室图》中“镇边楼”的位置与《蜀中广记》的记载大致符合。《成都城坊古迹考》也认为《宫室图》中镇边楼

① 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66，正统十三年五月乙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6年，第3222页。

②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倭缎》，明崇祯初刻本，第14页。

③ 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展望》，《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④ 如张克勤认为《宫室图》是现存最早且实测的成都地图，且“蜀王府的绘制采用了垂直投影方法”，此观点有待商榷。垂直投影是平面地图采用的一种几何投影方式。将地面点沿铅垂线投到水平面上，得到地面点在水平面上的平面位置，构成地面点的相应平面图形。而嘉靖《四川总志》载，蜀王府位于成都大城之中，处“武担山之阳”，形成为内、中、外三重城垣。其建制规模十分宏丽，这座蜀王宫城“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五尺。外设四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王府外围萧墙。若是垂直投影画法，蜀王府的萧墙、城门、宫室等都应该出现在地图之上，而《宫室图》中的蜀王府，只画出蜀府北部的城门，以象形画法画出蜀王府及周围萧墙，其余景观均未出现在地图之上，其详细程度甚至比不上《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中摹绘的《成都罗城图》。基于此，笔者认为《宫室图》蜀王府的画法并非是垂直投影，而是中国传统的象形画法。参见张克勤：《成都地图》，《四川测绘》1995年第4期；刘大谟：嘉靖《四川总志》卷1《藩封志》，第22页。

⑤ 参见潘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⑥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古迹》，第77页。

⑦ 王士禛：《陇蜀余闻》，转引自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第360页。

⑧ 参见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宫室》，第61页。

⑨ 曹学佺：《蜀中广记》，第52页。

的位置“与曹学佺所言者合”<sup>①</sup>。据此推断“镇边楼”或是“筹边楼”的误写。

另外，明代成都有关真武信仰的建筑实际有两处，即“真武宫”和“真武庙”。《宫室图》中的“真武宫”被绘制于府治东部，但“真武宫”的地理位置却在“成都少城西隅”<sup>②</sup>。成都少城于秦惠文王时所筑，汉、晋、隋、唐、宋时期均有扩建或培修，在蒙古军破成都后湮没<sup>③</sup>，其东部即“大城之西墉”<sup>④</sup>，可见少城的位置在明成都城的西部，则“真武宫”应在成都府治西。而另一处“真武庙”的实际所在，据嘉靖《四川总志》和天启《新修成都府志》记载，皆在“府治东”<sup>⑤</sup>。可见，《宫室图》中的“真武宫”当为“真武庙”的误写。

### 3. “丰宁仓”实为合写

《宫室图》的西南位置标有“丰宁仓”。成都方志均没有关于“丰宁仓”的记载，却有“广丰仓”和“广宁仓”，二仓“具在贡院西”<sup>⑥</sup>，和图中“丰宁仓”的位置相符。《明神宗实录》载：“四川王府禄粮于丰、宁二仓，内江、新都二县存留米内拨给”<sup>⑦</sup>，可见丰、宁二仓是供应藩王府的仓储，因其地位重要，被舆图标示出来。由此推断，“丰宁仓”实为“广丰仓”和“广宁仓”合写。

### 4. 同音指代同一景观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记载，“昭觉寺”在“成都治北十五里”<sup>⑧</sup>，与《宫室图》中“昭角寺”的位置相符。无论是地方志还是诗歌文集，现有文献资料均称“昭觉寺”而非“昭角寺”。由于“觉”“角”两字在明代读音相同，疑是用同音字指代同一地理实体，更有可能是明代绘图者所写的错别字。因此，成都市勘测志编纂委员会摹绘的《天启成都府治图》已将其纠作“昭觉寺”<sup>⑨</sup>。

## 结 语

综上所述，与同时期其他方志舆图一样，《宫室图》同样注重对政治、宗教、文教类景观的标识，同时，凸显中正和谐、注重等级尊卑和突出仿生取象（背后实则隐藏着自然地理环境对城市形态的深刻影响），明显带有顺承国家意志的刻意塑造。从图中可以窥见其绘制年代、公署布局趋势、宗教演化等信息，由于未超脱时代局限，难以反映城市经济的发展状况。

另一方面，方志舆图往往会渗透进绘图者的主观性思维<sup>⑩</sup>，以《宫室图》东北角的景观“马脚井”为例，查阅历代成都方志，均未有相关记载，其确实的地理位置当在什邡。嘉庆《什邡县志》载：“汉帝宫治西二十里马脚镇，街西中有井，名马脚井……康熙三十三年川陕二省客民访得旧址复修。”<sup>⑪</sup>什邡县在明代虽隶属于成都府管辖，但地理位置“东至德阳界十五里，

①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第337页。

②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55《艺文志续集》，第872页。

③ 参见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第84页。

④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古迹》，第73页。

⑤ 刘大谟：嘉靖《四川总志》卷3《祠庙》，第70页；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祠庙》，第58页。

⑥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公署》，第53页。

⑦ 《明神宗实录》卷176，万历十四年七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6年，第3256—3257页。

⑧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寺观》，第69页。

⑨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第83页。

⑩ 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展望》，《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⑪ 纪大奎：嘉庆《什邡县志》卷27，嘉庆十八年（1795）刻本。



西至新繁县界十五里，南至汉州界十里，北九十里入三江口，后抵茂州水西羌界”<sup>①</sup>，在成都府东北方向大约140里外。马脚井缘何被绘制于成都府治《宫室图》？莫非是为了彰显方志的编修处？时成都知府冯任考虑到成都之前的方志散佚已久，而四川总志对成都的记载又寥寥无几，担心忠魂义骨没于丘原，于是“开馆什邡，以县令谢奇举领其事”<sup>②</sup>，新修府志的纂修人员如易自成、杨懋芳等皆为什邡籍。这种打破常规、刻意为之的地理标识展现了舆图绘制者强烈的主观表达，而这种地理认知背后的特殊意图或可成为日后方志舆图研究的新旨趣。

古人云：“县必有境，匪图无以观广轮。县必有城，匪图无以观向背……绘图于册，展卷而视，不问不步，举在目中。”<sup>③</sup>由是可见，方志舆图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获得一定的地理信息，但若深入探究某一地区社会发展，则又绝不能简单、一味依赖图像信息，而需充分结合文献记载，图文对照、考证辨识，方能一步步贴近历史原貌。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杨卓轩

## 《岭南文化要览》出版

2022年10月，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专家队伍编写的《岭南文化要览》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入列广东地方史志丛书。全书除前言、编后记外，设5章、28节，共计20万字，插图100副。内容包括：第一章绪论，含岭南文化定义及渊源、构成、主要门类、主要特征等5节；第二章城乡文化名地，含概述、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景区等6节；第三章物质文化遗产，含概述、古遗址与考古大发现、民居祠堂寺观、名人故居与纪念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他文物等6节；第四章非物质文化遗产，含概述、传统戏剧曲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其他等8节；第五章历史名人，含概述、古代名人、近代名人等3节。

《岭南文化要览》旨在为大众提供一本文化普及性读物，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全面系统，涵盖岭南文化概念、城乡历史文化、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历史文化名人等方面；二是求真务实，集中推介岭南历史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对当代岭南文化的分类项目及状况，以国家及有关部门的认定为依据，简明扼要地展现岭南文化特别是其中有较大社会影响门类的基本状况，反映其在新时代历史条件下的发掘、保护、传承及利用；三是简明易懂，篇幅不长、表述清晰、语言通俗、图文并茂，贴合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阅读习惯，可以作为宣传推介岭南优秀传统文化、读懂广东的案头书，助力广东的文化建设。

（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①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2《疆域》，第42页。

② 冯任等：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1《成都总论》，第8页。

③ 佚名：嘉靖《仪封县志》，明蓝丝阑钞本。